

影视作品不仅提供茶余饭后的娱乐，更应承担记录历史、反映时代、传播文明的重任

从风口降落到坚实的大地上

侯鸿亮

- ① 《大江大河》剧照
② 《闽宁镇》剧照
③ 《父母爱情》剧照



▲古装剧《琅琊榜》(上图)《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下图)剧照

“第三只眼”看文学

拉开距离说“晚熟”

——看莫言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

潘凯雄

今年8月，莫言终于出版了自己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尽管出版一部新著对过去的莫言而言无异于一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常事，但他这次的出版行为却必将酿成一桩“事件”。何为？

莫言的创作力毋庸置疑，莫言的创作量虽算不上最高，但也绝不至于低到八年才出版一部作品，况且还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说的结集。莫言这是怎么啦？难道莫言也患上“诺奖后综合征”？单是这两个问号就足以具有强大的“吸睛”力，而一旦形成强大的“吸睛”力，自然也就成了一桩“事件”。果不其然，《晚熟的人》甫一面世，立即形成文坛乃至社会热点话题之一。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关于“晚熟”的热已然降温，拉开了这段距离再回望“晚熟热”和《晚熟的人》作品本身，或许也是一种“晚熟”。

《晚熟的人》的确有不同于一般作品之处，它足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观察、去考量，从而触发不同的话语：

——比如从市场反应角度。《晚熟的人》上市不足三个月，销量直逼60万。必须要点透这个60万背后的不易：第一，这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中国的文学图书市场上，新小说集的销量普遍远不及一部新长篇小说新作的销

量，而在当下市场中，一部新长篇的首发能在两万册左右就已是不错的业绩；两个月直逼60万册的销量即便是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排行进入TOP10应该不是问题；第二，尽管今年8月到11月我们已进入“后疫情时期”，图书市场开始缓慢复苏，但所谓“报复性”消费并未在这里出现，实体店尽管有两位数增长，但那终究只是以上半年的业绩为基数；线上渠道看上去热闹，但终究也只有三五个点的增幅；第三，依照前三个月的销售态势或过往的行业经验，60万册的销售绝对还远未触顶，高位在哪不好说，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晚熟的人》将会由畅销转为常销。仅此三点，绝对就足以称其为当下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比如从话语流行角度。《晚熟的人》中的“晚熟”二字迅速成为一个可以从诸如人生、处世、反讽、自嘲……等各个角度进行解读的社会流行语，一时间“晚熟”成为人们交流时的一种谈资。这种现象令人想起本世纪初中信版的引进图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和《邮差弗雷德》，书名中的“奶酪”随即成为“如何面对改变”的隐喻，而“邮差”则一度成为忠诚、敬业的代名词。这种现象很有意思，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彼时彼处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某种精神、情绪或心理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这或许也是莫言的这部新作迅速热销的缘故之一呢。

当然，这些个角度固然和《晚熟的人》皆有关联，但基本上又都还是游离于作品的边缘。至于《晚熟的人》，那是否意味着莫言创作的“熟”，那还得深入文本本身考察后再下判断，而且我相信这种判断依旧难免众说纷纭。

其实，在莫言这样层级的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间硬要分出个伯仲叔季，本身就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本文标题说的“晚熟”绝对不是说莫言在获得诺奖八年后的创作更加成熟，而是指较之于他此前的创作，《晚熟的人》中的艺术表现的确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我注意到这部集子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整部作品集收中短篇小说凡

1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创作于2011年；三篇起稿于2012年，但直到2017年才改定；四篇创作于2017年，四篇即创作于今年。在这12篇中，越是创作时间靠后者，其变化的痕迹就越明显。

这些个变化在《晚熟的人》上市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已为那些睿智的读者们一一指出。要感谢当下这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借助于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很便捷地转引罗列几则有趣而又有事实支撑的说法：

比如：打滑的文风不再明显，溜冰看不到了；

比如：依然是取自故乡人事，但奇人异人少了，更多的是聚焦当下，融入自己对社会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比如：不再聚焦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

人物；

比如：过往那种汪洋恣肆、梦幻传奇的东西少了，更多了些冷静直白、静观自嘲；

比如：12部作品中的11部都有一个老莫言之外的新莫言出现；

……

以上描述的这些变化虽未必完全确切，但大体也都是客观存在。何以要“变”？固然可以从求新求变是文学创作永恒的追求这个角度来解释，但如果我们将莫言的这些变化置于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予以考察，或许又会有另一番心得。

莫言的处女作虽发表于1981年，但其成名却要等到四年后《透明的红萝卜》面世，特别是再往后一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刊出，莫言这两个汉字在新时期文坛留下的深厚烙印就再也无从抹去。那毫无羁绊的奇特想象、对色彩的奢侈泼洒、对通感横冲直撞的调度以及恣意纵横的叙述都使得看惯了传统文学作品的文坛为之一惊：红萝卜咋就透明了呢？抗战居然还可以这样表现……其实就在莫言名声大振的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迅速崛起，那就是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马原等一批青年作家的迅速崛起，他们的创作固然各有其特点，但其共同的“先锋”称号又昭示着他们创作的一个相同点——实验性。莫言与这批“先锋”作家同时同场亮相，但同样充满实验性写作的莫言却从未归于“先锋”的大旗之下，

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难道就仅仅只是因为莫言稍稍年长一点，还是莫言的实验表面上没有那几位作家走得极端？这些似乎都是题外话了，但不管怎样，莫言也好，先锋作家也罢，无论他们间的创作呈现出多大的差异，但其文学创作的血脉中都流淌着一支共同的血型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自19世纪末兴起至20世纪上半叶走向极盛的虽名目繁多但却被统称为“西方现代派”的文学。

站在今天来回望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这段文学发展历史，无论如何评价，本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总得承认这股文学思潮在那时的出现一定有着当时社会的、时代的、文学的等多重原因综合使然。而如果我们视野进一步放大、视线进一步拉长，我们同样又会发现：世界上的许多文学创新的始作俑者一开始常常都是以极端甚至偏激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追随者则或多或少地带有生涩的痕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极端的文学方式渐呈司空见惯之势后，那些个创作上曾经走过的“极端”便随之开始“反拨”，当然这些个“反拨”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新层面上的一次新的融合。考察上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以及新世纪后的中国文学，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发展变化的轨迹。

离开《晚熟的人》而极为这段略概括地回溯了刚刚过去不久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想为莫言何以“晚熟”提供一个更宽的视野和更长的视线。置于这样一个稍大些的时空之中再来看莫言的新作，变化显而易见。不仅莫言在变，余华、格非、苏童……后来的写作不也同样在发生变化吗？而仅就莫言的“晚熟”而言，给当下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是多维度的，比如对深刻性与可读性关系的处理，比如对叙述主体的“复调”式的使用，比如明写实暗反讽的鲜明对比等等，只是限于篇幅就无法一一展开了。

一句话：我想在获得诺奖八年

后，莫言如果依旧不见新作，或是推出的首部新作依旧“一如既往”，那就不是“晚熟”而是“夹生”或“熟大了”呢。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名家笔谈

◆从炙手可热的高科技创业，到贫困山区的区域扶贫，我们从风口降落到黄土地上，土地和人民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

◆《闽宁镇》主创团队用了很多时间进行调研、采访，跟福建和宁夏的干部、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从商人员、村民们对话，不断受到心灵的冲击。就是这些坚韧不拔的人民，让整个移民工程、扶贫工程得以实现。站在土地上，身处人民中间，力量会自然迸发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多元、多变的新时代生活，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也要不断寻找更本真、更艺术的书写和表达

回顾我们团队这些年来的创作，最核心的理念还是从创作的本体出发，不断适应市场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坚持。

这些创作，一方面继承自鲁剧的创作传统，以丰厚的地域文化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为底蕴，在选题上几乎涵盖了中国100多年来的每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百姓生活，用《闯关东》《生死线》《战长沙》《北平无战事》《钢铁年代》《知青》《父母爱情》《温州一家人》等十余部作品，最大程度地再现了一个世纪的集体回忆，打通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精神联系；一方面有我们对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电视剧选题的思考，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多元、多变的新时代生活，我们的电视剧创作，也要不断寻找更本真、更艺术的书写和表达。我们近几年的作品，对各个时期的各种题材都有涉猎，有在隐秘战线上殊死较量的《伪装者》，也有在平凡岗位书写职业高光的《外科风云》，有反映古人千秋情义的《琅琊榜》，也有表现当代儿女砥砺奋进的《大江大河》，有描绘城市众生相的《欢乐颂》，也有直击家庭痛点的《都挺好》。

在进行上述多元化创作之后，我们在选题方面一度产生过迷茫，有过很多想法，比如曾跟着大众的注意力，来到风口上，想过做科技巨头的创业故事，看了很多资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了《闽宁镇》的创作任务，做一部讲述一个移民小镇、通过东西协作扶贫走向全面小康的电视剧，也有在平凡岗位书写职业高光的《外科风云》，有反映古人千秋情义的《琅琊榜》，也有表现当代儿女砥砺奋进的《大江大河》，有描绘城市众生相的《欢乐颂》，也有直击家庭痛点的《都挺好》。

我们面对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以一贯之的原则，《闽宁镇》的创作周期虽然比较短，但是我们仍然把一半的时间，都用在寻找方向、打磨大纲上。主创团队用了很多时间进行调研、采访，跟福建和宁夏的干部、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从商人员、村民们对话，不断受到心灵的冲击，这些亲历者、受益者的群体记忆和个人经历太鲜活了，让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闽宁镇这个选题的合理性、实践性、发展性，在创作中把共情做到了极致。就是这些坚韧不拔的人民，让整个移民工程、扶贫工程得以实现，这就是我们找到的宏大命题和落地创作的交集点，站在土地上，身处人民中间，力量会自然迸发。

现在《闽宁镇》已经拍完了，后期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公司内部提前组织了观看，举一个看片时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的剧情，剧里的白校长带着戈壁滩小学的孩子们参加自治区的合唱比赛。拍这场戏的时候，学生们是不用演的，他们就是当地小学的孩子，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站在礼堂里，他们就会用最洪亮的声音去放声歌唱，没有经过修饰和雕琢，他们有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永远向上的精神。有90后、00后员工看完片告诉我，真的太受触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一条裤子三个兄弟穿的贫困地区，那里的人们，现在像他们一样喝茶、收快递，为同一条短视频点赞。这样的发

展历程，是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国家政策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西海固人民要有离开世代生活的地方，把根扎到更广阔的地方的勇气；福建各行各业的

工作者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中，要有实事求是的基层干部去为每一户移民的供电，每一亩庄稼的灌溉奔波，从地窖子到土坯房再到砖房，从打工积累资本到发展庭院经济再到产业升级，从脱贫致富到思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每一分发展，都得有人挽起袖子干出来。我们的剧就是从个体的成长和经历入手，展现“闽宁模式”的发展，调动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共情，讲述希望和发展，这个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永恒命题。我们希望把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整合在这部剧里，把闽宁镇这个题材的现实意义发挥到最大化。

除了《闽宁镇》，我们接下来几部戏，会贯彻我们以往的作品品格，即将播出的《大江大河2》继续第一部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们在历史转型新时期的挣扎、觉醒和变异。他们是历史浪潮的“弄潮儿”，是千千万万建设者的缩影。《大江大河》系列，不仅是我们对20多年主旋律创作的一次总结，也是我们这些改革开放同龄人，对于这个时代最深切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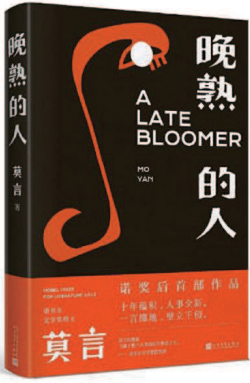
已拍摄完成的《落花时节》是一部中年群像，讲述这个社会中年群体与命运搏斗、与欲望纠缠，最终与生活和解，与知己肝胆相照的故事。相比年轻人的奋斗，这部戏的底色会更浓郁一些，人到中年，不断面对生活难题，必须负重前行。

正在拍摄中的《乔家的儿女》，是以三十年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乔家的五个孩子在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乔家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的缩影，也是渺小却真实的大多数。通过乔家五个兄弟姐妹的成长经历、社交工作、婚姻生活，展现了平凡生活中的坚韧与美好，同时也呈现了中国传统观念中美好的“家”——尽管清贫，尽管磨难重重，但心底最深处的爱和牵挂不会缺席。

目前还在剧本创作中的《生命树》，讲述了生活在格尔木的白葛根一家人收养了走失的小女孩白菊，她长大后在青海建立了第一个牦牛科研试验基地，又办起了牦牛肉食品加工厂，带领乡亲们摒弃传统挖煤盗猎的谋生方式，改做生态产品脱贫致富的故事。主人公们的人生与这片热土息息相关，他们帮助乡亲们致富“奔小康”，也为保护和建设家园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生命树》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根植了希望，必将收获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仅仅提供茶余饭后的娱乐，更应当勇于承担起记录历史、反映时代、传播文明的重任，做到习总书记提出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作者为知名制片人)



▲《晚熟的人》
莫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